



刘进 著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文化诗学研究

 巴蜀书社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文化诗学研究

刘进著

巴蜀书社

中国·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诗学研究/刘进著. - 成都:
巴蜀书社, 2003.9
ISBN 7-80659-519-8

I. 弗... II. 刘... III. 詹姆逊-诗歌-文学理论-
文学研究 IV. I71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0998 号

责任编辑 黄云生
封面设计 李文金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诗学研究 刘进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86656816 发行科电话(028)8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625 字数 160 千
2003 年 9 月第一版 2003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659-519-8/I·186 定价:1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诗学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之一。其诗学是适应世界范围内文艺研究的文化转向，针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现实、文学/文化及诗学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诗学的基础上，广泛调和各种异质理论而形成的。对历史的独特理解是詹姆逊文化诗学的理论基石：历史是不可再现的，但又只能通过文本而为人们所接近。历史的文本化受到意识形态的遏制，但文本并非就是意识形态的，文本是意识形态功能和乌托邦功能的结合体：文本的表层是意识形态的，文本的潜层则是乌托邦的，后者被前者压抑为“政治无意识”。这样，历史的文本化本质上是寓言化，寓言成为历史不可再现的再现方式。寓言化的文本需要寓言化的阐释：文学阐释既是对文本表层意识形态的“祛伪”，也是对文本深层历史乌托邦的恢复。詹姆逊的文学阐释学力图通过形式批评来实现社会历史批评，通过文本的纯形式研究来实现形式的意识形态研究，使历史在文本的多次阐释中逐渐现身。历史理论、意识形态思想、寓言观以及阐释学，这构成了詹姆逊文化诗学最基本的内容。

詹姆逊的文化诗学不是一种普遍诗学。其诗学是在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当下的文学/文化困境中的一种理论期待和探索，是对当下资本主义文化困境的反省与批判，是在资本主义内部对一种全新的政治艺术的召唤。其诗学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内部构成一种抵制、挑战的他性力量，最大程度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诗学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

尽管詹姆逊诗学因对众多理论的调和而呈现许多矛盾，但是他建构诗学的问题意识、民族立场、理论视野不仅对西方是重要的理论资源，对我们今天建构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民族诗学也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本书将结合詹姆逊诗学形成的背景，抓住詹姆逊诗学中的四个基本问题，对詹姆逊诗学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本书将以两篇附论的形式具体深入研究詹姆逊诗学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马克思主义诗学的文化视野，以进一步深入把握詹姆逊诗学与马克思主义诗学的联系，并思考其对我们的文艺研究和诗学建构的意义。同时，本书将以一篇附论集中梳理中国目前的文化诗学和文化批评。

序

李益荪

两年前，也就是2001年的上半年，我在评审本书的前身——刘进的硕士论文《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文化诗学研究》时，曾作出过这样的评价：它“应该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部真正意义上对詹姆逊的文化诗学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研究的著作。”今天，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这一看法。

我这里所说的“第一部”当然不是时间意义上的。事实上，在刘进写论文之前，詹姆逊早就是热门话题了，谈论他的人多的是。我的意思是说，真正从总体上读懂了詹姆逊，达到了深入理解、融会贯通的境地，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能真正地持比较客观的态度和立场，在力争还其学术思想以历史的真面目的基础上，去作出自己的阐释和评价的，这算是第一部。我想，我偏处一隅，孤陋寡闻，单凭自己目力所及作出的这一“排序”，很可能并不准确。不过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而真正重要的，还是我们的学术著作究竟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品格这一问题。

学术研究是离不开阐释的，刘进的这本书更是以阐释为主。这就涉及到我国学术界近年来流行的关于现代阐释学的话题了。

现代阐释学的一个核心的观点，是主张一切阐释都不可避免地打着阐释者所处的客观条件及其主观、个人的印记。这本是一个很深刻的观点。但如果把它发挥成当下许多人众口一词宣扬的那种阐释可以主观任意，不必有什么客观的标准和尺度之类的主张，并付诸实践，这就是十分偏颇和有害的了。照我的看法，近年来学风空疏，游谈无根之风甚嚣尘上，其根源就在此类观点上。

我以为，阐释务须科学和慎重，阐释存在着悖论，这才是我们所应引出的结论。

从绝对的意义上看，历史是永远无法复原的，因此，阐释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从相对的意义上看，历史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无限地切近、把握和复现，因此，阐释是可能的和必须的。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一个真正成功的阐释者首先必须花大功夫下大气力对被阐释的学术文本的语境、内涵和特征等作出尽可能准确、深入、客观、全面的理解和把握，在这个阶段，他应信守“尊重客观事实”的原则，无权去揣度、臆测。而只有在这一科学、慎重地把握的基础之上，也才谈得上阐释的第二层次——在新的语境中对文本意义的开拓和扩展。阐释的意义和价值当然往往是在这个层次，因为它使得文本获得了新的生命，成为“说不尽的”，成为人类思想行进的轨迹。

这样的阐释才不会沦为有意无意的歪曲或是改头换面的剽窃，才称得上是严谨、科学、学术品位高尚的阐释。

当然，这样做是非常之难的，需要付出极为艰苦甚至是整整

一生的努力。记得当年邓之诚先生在研究顺治、康熙时代的历史时，苦心收罗第一手资料，勤比析角，殚精极虑，竟达到了与那个时代许多著名人物心灵相通的“神会”境界，一时传为史学界的美谈。前些年，曾读到邓先生学生的一篇文章，回忆老人暮年，安排后事，把自己穷毕生之精力收得的顺康人别集转让给国家图书馆时，那种精神恍惚，难舍难分的情景，真是使人不由得产生出“哲人其萎”的无穷感慨！

刘进的这本著作当然不是，也不会是十全十美的。这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说，其一，詹姆逊本人就是一种异质文化的代表，而没有对这种文化的直接体验乃至融入，则研究就不可能没有相“隔”之处；其二，詹氏的学术思想是多种异质理论的综合，充满了内在的差异、矛盾，甚至是混乱之处，需要广阔的理论视野和超越性的识力，更何况詹氏仍健在，他的思想仍在发展和演变，一时哪里说得尽！但既然已有了好的开头、好的起点，再加上年富力强，思想敏锐而深刻，又有为学术研究献身的志向和精神，我相信，刘进是会为自己创造一个广阔而且灿烂的前景来的。

是为序。

2003年5月于四川大学

目 录

导论 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诗学·····	(1)
第一章 历史化视野·····	(16)
一、返回历史的努力·····	(17)
二、历史·语言·总体·····	(20)
三、绝对历史主义·····	(25)
第二章 意识形态·····	(35)
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诗学思想·····	(36)
二、总体与意识形态·····	(53)
三、政治无意识与乌托邦欲望·····	(58)
第三章 寓言·····	(65)
一、“寓言”理论简述·····	(66)
二、寓言与象征·····	(69)
三、民族寓言·····	(73)
第四章 阐释·····	(81)
一、真正的社会学文学批评·····	(82)
二、内在形式·····	(87)

三、詹姆逊文学阐释学的双重视角·····	(95)
四、詹姆逊文学阐释学的理论渊源·····	(101)
五、詹姆逊文学阐释学的理论框架·····	(109)
余论：后现代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诗学·····	(118)
附论 1：詹姆逊诗学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133)
附论 2：马克思主义诗学的文化视野·····	(158)
附论 3：对中国当前“文化诗学”的思考·····	(175)
参考文献·····	(192)
后 记·····	(199)

导论 一种马克思主义 的文化诗学

就美国的情况而言，正如迈克尔·邓宁（Michael Denning）在为文化研究的先驱和竞争对手美国文化研究辩护时所说的那样，文化研究能够同样被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替代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文化研究”》^①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 1934— ）这个名字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已不再陌生。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来华的讲演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度曾是中国了解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入门书。他 1954 年在哈佛福德学院获

^①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413 页。下引此书均依此版本，不再说明。詹姆逊在汉语里又译为詹明信、杰姆逊等，在本论文正文（含引文）中一律统一采用詹姆逊这种译法。

得学士学位，并于1959年在耶鲁大学获取文学博士学位。从1959年开始，他先后在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耶鲁大学任教，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文学系主任。詹姆逊是国际上公认的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望^①。步入学术界以来，他一直以自己独特的声音站在批评理论的前沿，其主要代表作有：《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1961）、《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语言的牢笼》（1972）、《政治无意识》（1981）、《理论的意识形态》（1988）、《晚期马克思主义》（1990）、《后现代主义，或曰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1）、《地缘政治美学》（1992）、《时间的种子》（1994）、《布莱希特与方法》（1998）等等。其中《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语言的牢笼》《政治无意识》被称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部曲巨制。除著作外，他还发表了丰富的论文。詹姆逊的著作主题纷呈，范围广泛，在当今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仅在其《政治无意识》问世后的第二年，美国最重要的文艺理论和思想理论刊物之一的《辩证批评家》就出专号来讨论其批评理论。据王逢振先生称，《政治无意识》“如今已成为美国大学研究生的必读文本，不少学生以它作博士论文，而且已有四部研究它的专著出版”^②。这印证着一些研究者的看法：在美国和世界当前的独特局势下，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出现本身就是个首要事件，

^① 参见王逢振《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中记载的众多对詹姆逊的评价，载王逢振《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下引此书均依此版本，不再说明。

^② 王逢振《政治无意识和文化阐释》，载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下引此书均依此版本，不再说明。

“是当下理论界最不寻常，最使人困惑的现象”^①。事实上，詹姆逊的出现不仅对于西方和美国学术界是一个重要事件，对中国学术界而言也是颇具启发意义的：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的重铸无疑对我们一直倡导的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力的参照，尤其是怎样结合民族传统和民族、世界现实来重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或许，正是由于有着这样的参照意义，詹姆逊与中国似乎有着解不断的缘分。他曾先后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度访华讲演。自他第一次来华及其讲演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发表后，詹姆逊的学术观点、思想成为中国学人讨论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等经常征引的材料。介绍、研究他的中文成果一方面散见于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诗学）和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著作中；另一方面，据笔者所知，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各种学术刊物上专门讨论詹姆逊的单篇论文有近20篇；同时，詹姆逊的著作中已有很大部分被译成中文，其单篇论文或被收录于各种主题性中文论集，或汇集成册以中文发表。这对于一个还活跃于世界学术界的学者而言，是罕见的。

虽然詹姆逊在国际学术界是研究的热点，但系统研究的专著在国内很难见到，译成中文的只有一本；同时，国内学界对詹姆逊的研究大多停留于译介阶段，即使有些论文有较强的研究性，

^① 谢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学》，陈永国、王逢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下引此书均依此版本，不再说明。

也还不系统^①。正是基于此，笔者选择詹姆逊作为研究对象，力求比较系统地考察和研究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诗学。

作为一个涉猎颇广的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在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以马克思主义的主导话语为基础，通过与其他各种异质性话语的对话，建构了其独特的诗学理论。对詹姆逊的诗学理论，中外研究者赋予了不同的称谓，有“辩证批评”、“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学”、“文化政治诗学”、“文化学的阐释美学”等。我选择“文化诗学”来概括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诗学理论。我之所以选择这个称谓，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理由：第一、詹姆逊在第一次来华讲学时，就声明自己“可以说是一个文化批评家”，“在我推荐的阅读材料里，我选择了阿多诺（T·W·Adorno）、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原译为本杰明）、卢卡奇（G·Lukacs，原译为卢卡契）、弗洛伊德、阿尔都塞（原译为阿尔图塞）的作品，并不一定是作为文学批评来读，而是作为文化批评的材料。”他坚持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观点：“文学教师必须把他们研究的对象当作一种文化的产物，这样才有可能认识作品的意义和本质。”^②可见，其诗学理论主要坚持的是一种文化研究的思路；第二、选择“文化”作为考察詹姆逊诗学的视角，能够与其繁杂的理论相称，便于拓展研究视野，对其做系统、深入的研究；第三、詹姆逊诗学的形成与国际文学研究逐渐走向文化研

^① 在本书初稿（2000年11月完成）将完成时，国内第一部研究詹姆逊的专著《文化的政治阐释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出现在书店，作者是近年参与翻译詹姆逊著作的陈永国先生，该书尽管仍然有很多介绍性的内容，但已初具研究性和系统性。

^② 杰姆逊讲演《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下引此书均依此版本，不再说明。

究的这一背景密不可分（这是我下文将详细探讨的问题）。

一、詹姆逊文化诗学的学理背景

詹姆逊在其著名的长篇论文《元评论》中倡导文学阐释的“评论之评论”，强调阐释必须包括对自身的阐释，“因此真正的解释使注意力回到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历史环境，也回到评论家的历史环境。”^①这不仅是詹姆逊倡导的原则，而且也应作为我们研究詹姆逊的一个重要原则：在具体阐释、研究詹姆逊诗学之前，首先应该弄清楚形成其诗学理论的历史环境或学理背景，即首先必须弄清詹姆逊是在什么学理背景下倡导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诗学的，他为什么这样做。

有学者曾比较详细地考察了西方学术界对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弗洛伊德等的文学观念的缺陷的分析，认为“需要文化学说的声音，来自四面八方，响彻西方学术界的各个角落。可见二十世纪各国文坛多么迫切需要有关文化的文学观念的拯救与滋养！”^②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在新康德主义的影响下，西方哲学就出现了“一种文化学的整合和转向，出现了用文化来涵盖人类一切活动及其成果，以文化来概括和分析人类社会的文化哲学”^③。只是，这种文化转向在20世纪前半段，被更

^①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第4页。

^② 许汝社《文学与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的回归》，载翁义钦主编《外国文学与文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下引此书均依此版本，不再说明。

^③ 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第419页。下引此书均依此版本，不再说明。

为明显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所掩盖,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精心建构的“语言乌托邦”(linguistic utopia, 王一川语)开始走向解构的时候,这种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转向才越来越明显,迄今仍显示出强劲活力。这种文化转向趋势波及到文学艺术领域,使得文艺研究中的语言或形式主义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无论在东方或西方,艺术文化学的研究都颇具规模和声势。”如前苏联针对俄国形式主义而提出的“文化系统中的艺术”(卡冈)、“艺术文化学”(鲍列夫),西方针对新批评,格拉夫、查尔默斯、霍伽特等都强调文艺的文化关系或文化背景^①。可见,西方20世纪诗学尽管以语言为中心,但从20世纪中叶开始,则呈现越来越明显的文化转向趋势。

同时,诗学的文化走向与马克思主义诗学本身就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有学者明确提出:“阐明文学的本质与文化的关系,指明文化对文学的重大影响,这只不过是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是还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的本来面貌,是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的回归。”^②的确,文化是马克思主义诗学的一个重要视野。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诗学中,马克思更关注的是文学艺术的“生产”问题,他主要从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结合处来研究文学艺术;恩格斯的文学批评,诸如对挪威文学、对歌德的评论,事实上也是一种文化分析模式;而列宁评论托尔斯泰的系列文章也无不闪耀着文化批评的火花。因此,“文化”即使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诗学的核

^① 参见周宪、罗务恒、戴耘编《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译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下引此书均依此版本,不再说明。

^② 许汝祉《文学与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回归》,载翁义钦主编《外国文学与文化》,第3页。

心视野，也是一个很重要而长期为人所忽视的领域。正如里夫希茨所言：“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真正的眼界开阔建立在对文化史实进行经常不断的研究之上，并且是同深入研究这些史实本身的现实运动相结合的。”^①无疑，其诗学的开阔眼界也是建立在一种广泛的文化分析基础上的。如果说，文化仅仅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领域的話，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将其当作了全部理论的中心。诚如安德森所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国家或法律。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②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诗学的主流是一种文化研究的路向，这一路向到20世纪70年代，与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转向汇合而达到极致。甚至可以说，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参与，才基本上结束了“语言学转向”，而形成文化转轨的大趋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诗学与文化诗学实现了合流：坚持马克思主义诗学必然地呈现文化趋势，坚持文化诗学必然地与马克思主义发生关联。

以上勾勒的诗学的文化走向，尤其是这一走向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诗学的汇合态势，正是詹姆逊步入学术界的背景。这一背景为詹姆逊的诗学理论成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诗学提供了可能。这种可能一方面还必须适宜于美国的文学批评土壤，另一方面又必须切合詹姆逊的个人学术旨趣，才可能成为一种必然。

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诗学态势逐步走向明朗化的时期，恰恰

^① 里夫希茨《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第11—12页，转引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12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284页。

^②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7页。下引此书均依此版本，不再说明。